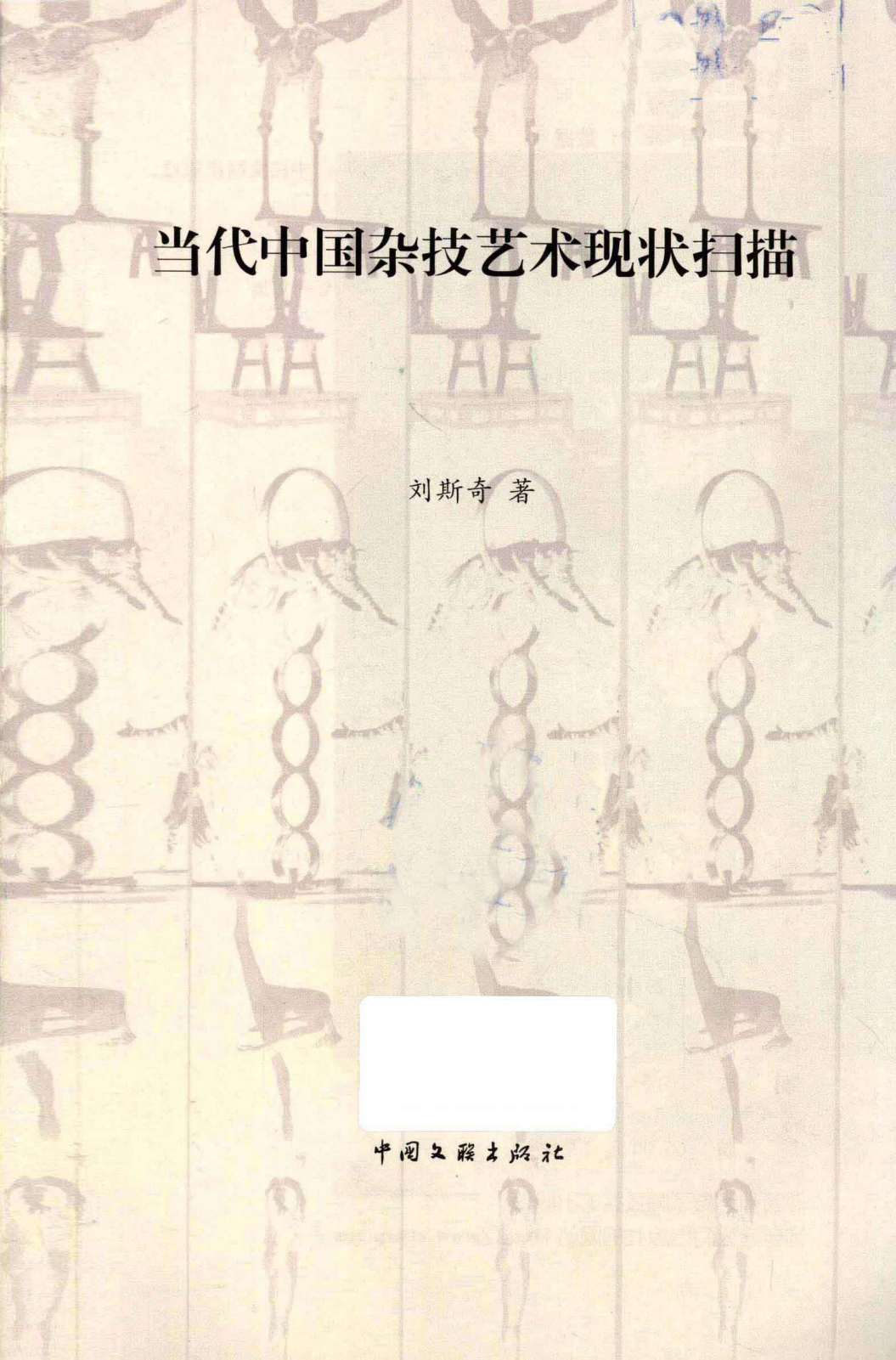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

刘斯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sepia-toned illustrations of various circus and acrobatic acts. These include figures performing on high stools, balancing acts, and other theatrical stunts. The pattern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creating a sense of rhythm and movement.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

刘斯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 / 刘斯奇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59-7626-9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杂技—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 J8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4221 号

书 名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
作 者	刘斯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媛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626-9
定 价	6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战士杂技团《天鹅湖》

目 录

CONTENTS

1	序 我与杂技的情缘
29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
179	突出本体·瞄准市场 ——有感《龙幻》
185	欢乐谷中的《梦幻神曲》
191	杂技与市场经济的思考
201	杂技演出市场分析
221	杂技演员儿童时期均衡的知识教育 与杂技的可持续发展
235	龙的启示 ——记贵州专业表演艺术第一块世界金牌 获得者龙军、龙兵
255	后记

序

我与杂技的情缘

在1996年之前，面对杂技，我只是一个普通观众而已。

虽然我从踏入社会之时起就与舞台艺术结缘，但那时目光关注的焦点则是戏剧。

与杂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缘于贵州省杂技团龙军、龙兵两兄弟演出的《双钻桶》——在1987年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贵州省杂技团的龙军、龙兵两兄弟演出的《双钻桶》获得了银狮奖，紧接在之后的1988年11月12日，在摩纳哥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的比赛中，龙军、龙兵演出的《双钻桶》获得了那次大赛的唯一金奖——金K奖，这是贵州杂技界首次获得的世界级金奖，为此，受贵州省文化厅的委托，我采访了龙军、龙兵，之后，便以这个获奖的《双钻桶》为线索，就龙军、龙兵在杂技方面取



得的艺术成就及其从艺经历撰写了一篇题为《龙的启示——记贵州专业表演艺术第一块世界金牌获得者龙军、龙兵》的文章，全文约一万余字。【载《1990贵州省专业艺术资料汇编》黔新出（91）图字第61号】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以杂技为题的文章，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我与杂技再续情缘的契机却迟迟没有出现。

转眼间，七年的光阴便这样过去了。

当历史进入1996年时，一次不经意的会议邀请，促成了我与杂技的情缘再续——1996年初，时任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的秘书长钟兴义邀请我们贵州省艺术研究所的几位同事撰写杂技论文，参加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组织的全省杂技理论研讨会，目的是为即将举行的1996年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做准备。那时，我对杂技舞台的现状是比较陌生的，为此，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1995年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实况的录像。在阅读和观看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被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出的《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所吸引，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不时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杂技艺术现状缺乏了解的我，不仅被这个节目中精彩的高难度技巧所征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节目中，我看到了超越之前我所看过的杂技节目中所不具备的一种创新、一种美感——一种把技巧与一定的叙事手法相结合的艺术创造，从而使原本只关注技巧的杂技具有了一定的叙事能力。经过对战士杂技团这种创新意识和艺术实践的梳理和思考，我的第一篇杂技论文《〈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的艺术个性及

其意义》终于得以完成。与此同时，我还撰写了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杂技的本质特征与审美价值——兼论杂技的英雄意义》的文章。

1996年8月12日至15日，在贵州省文联五楼会议室举行的贵州省杂技理论研讨会上，我宣读了才脱稿的这两篇论文，在15日举行的闭幕式上，会议主持人宣布我的这两篇论文被推荐参加第四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根据会议上杂技界及与会的老师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随后便由贵州省杂技家协会报送中国杂技家协会。

1996年9月1日至4日，第四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所在地举行。会议期间，我们观看了战士杂技团的其他演出录像，在排练场观看了小学员们的练功，同时还观看了演员们的排练，参观了荣誉陈列室中一排排记录着战士杂技团辉煌业绩的奖杯、奖状……会议过程中的种种感受和昨天所写论文时的思考交织在一起，给对舞台艺术并不陌生的我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一个新的理论切入角度。这次会议不仅把我带进了杂技这个大家庭，而且对我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从那时开始，杂技的现状便成为我关注与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第四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结束后，《〈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的艺术个性及其意义》获1996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一等奖。【载《杂技论坛》华文出版社·2000年】《关于杂技的本质特征与审美价值——兼论杂技的英雄意义》获1996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二等奖。【载《贵州省优秀杂技论文



选·1992—1996《黔新书97准字09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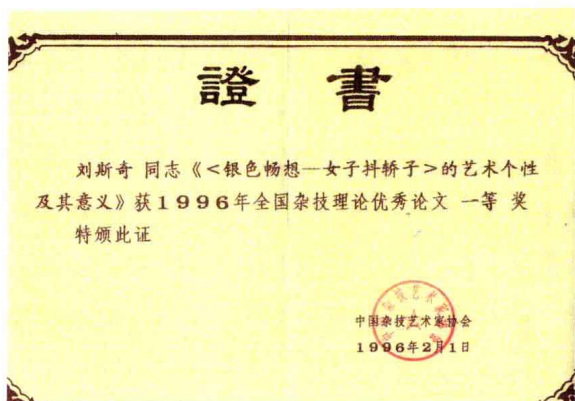
这个出乎预料的结果，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成为激励我在杂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努力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第一次进入杂技理论研究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励，我想应该与我之前艺术知识的积累密切相关。

我1958年考入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后更名为贵州省戏曲学校，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专业是京剧表演艺术，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京剧团。由于平时喜欢文学，在练功、排练、演出之余便开始学写一些那个年代经常演出需要的各种形式的小节目，然后学着写小戏，再后来创作大戏……先后创作、改编的《古侗传奇》、《碧血恨》、《大渡魂》、《蹉跎岁月》、《左维明智断无头案》、《小刀会》六种大型戏曲剧本，或搬上舞台演出，或在刊物上发表。《大渡魂》获第二届贵州省戏剧文学大戏三等奖。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我从贵州省京剧团调至贵州省文化厅，分配在创作室工作。

在1981—1983年间，我有幸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攻读戏剧理论，正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这两年的学习，奠定并改变了我这一生的知识结构。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从〈奢香夫人〉谈民族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的《戏曲研究》第11辑（1984年）发表，文章被安排在头条的位置。从那时起，对舞台艺术理论的研究便成为了我的学术主攻方向。



从1979年我进入贵州省文化厅到1996年我写《龙的启示——记贵州专业表演艺术第一块世界金牌获得者龙军、龙兵》这篇文章的十多年间，虽然我关注的焦点不是杂技，但杂技毕竟是舞台艺术的一个品种，作为同是舞台表演艺术的杂技，在表演理论和美学追求等许多层面，与戏剧是相近或相通的，正是依靠之前在戏剧研究方面打下的基础，我才较为顺利的进入杂技的研究领域。

从另一角度看，1996年杂技带给我幸运的另一个因素，与当时杂技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杂技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杂技理论的建设则是在近几十年来才得以发展的：“1985年，中国杂技家协会设立了研究部；1987年开始，由七省一市发起组织的地域性杂技理论研讨会，后发展为由十一省一市联合主办。1992年中国杂协将当时分散的、不定期的理论研讨活动确定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杂技



理论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由中国杂协确定研讨议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杂协负责组织论文的撰写和推荐工作，参加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并设立全国优秀论文奖、杂技理论 research 组织工作奖。从1992年至1998年，一年一度的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共举办了6次，全国优秀论文奖评比了7次。在中国文联的大力帮助下，理论奖的评奖工作自1998年起被纳入中国杂技‘金菊奖’的奖项，这是中国文联系统各文艺奖项第一个立项的理论奖。之后，中国杂协又与中国文联联合举办了五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并进行了5次‘金菊奖’理论奖的评奖。”

【林健：《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杂技》】

正是得益于当时一年一度的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的举行，从而促使我每年都会把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杂技的关注与研究之中，亲近杂技，了解杂技，进而对杂技现状进行理论的思考。

1997年5月15日，在贵州省杂技家协会办公室，我从时任秘书长钟兴义手里接过了中国杂技家协会颁发给我的第四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获奖论文的奖状和奖金，秘书长钟兴义同时还告诉我，第五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今年下半年将在贵阳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儿童与杂技”，贵州省杂技家协会是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主办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希望把这一届会议办得出色、办得成功，也希望贵州的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为贵州省杂技界争光。并希望我尽快的投入到论文的写作之中，以便参加在下半年举办的改稿班。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既兴奋又有压力，因为“儿童与杂技”这个论题对我来说是比较

陌生的，但作为东道主的一员，我知道这次写作论文所特有的意义和分量，随即，我便投入到对“儿童与杂技”相关情况的调查和资料的搜集与论文的写作之中。8月11日，我带着刚完成的论文初稿参加了贵州省杂技家协会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改稿班，之后，根据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

1997年10月20日，第五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在贵州省军区大礼堂拉开帷幕——这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组织的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在贵州省召开的会议。会上，我宣读了我的论文《杂技演员儿童时期知识的均衡教育与杂技的可持续发展》，会议结束后，我的这篇论文获1997年全国杂技理论优秀论文二等奖。【载《杂技论坛》·华文出版社·2000年】

1998年6月25日，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给我颁发了贵州省杂技家协会会员证，从此，我成为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的一名会员。

也就在同时，贵州省杂技家协会给了我一份将在11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的通知，会议的主题是“杂技与市场”。通知中的一个好消息是：杂技理论优秀论文奖的评奖工作从1998年开始，纳入中国杂技金菊奖的评选范围，成为中国杂技金菊奖的一个奖项。

相比较1997年的“儿童与杂技”而言，我对1998年的论题“杂技与市场”要熟悉许多。原因是：自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贵州省艺术表演团体的生存现



状——舞台艺术所面临的演出危机——演出市场的低迷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而当时直接与我关联的一个重要契机，则是1987年文化部下发的“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全国表演艺术团体进入到“双轨制”的改革之中。所谓“双轨制”，即一部分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全民所有制形式，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主办；一部分由全民所有制转为集体、个体所有制，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在那次浩浩荡荡的改革大潮中，作为当时贵州省文化厅改革试点的重点单位之一，我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以贷款10万元的方式组建了贵州省第一个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为经营管理模式的民营艺术表演团体——贵州省轻音乐团。

1988年的10万元，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200元出头的我来说，大约相当于我当时月工资40年的总和，虽然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但当时的我们对未来却充满了信心。

1988年1月开始组团，3月18日在贵阳市中华北路的政协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我带领贵州省轻音乐团，南从三亚、海口，北到大连、沈阳，东起上海、杭州，西至新疆奎屯、塔城……那时，一个演出点少则演出两天、三天，多则七天、十天，一年演出300多场，除春节外，几乎天天都在演出。

在1988年初至1989年春这段时期中，轰轰烈烈的改革，红红火火的演出，社会办团的新鲜，使我们贵州省轻音乐团成为

贵州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政治家们关怀的对象，那种温暖，那种支持，激励着我们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幼稚开始制定下半生的长期规划。

但人算不如天算。

1989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出现及随之带来的影响迅速波及到全国所有的领域，对我们而言，具有切肤之感的便是演出市场的急剧变化——我们与剧场或演出公司签订的许多演出合同被对方单方面地撕毁了，面对空空无人的剧场，计划中的许多收入因此而成了泡影。队伍虽然仍在坚持演出，但日甚一日的不敷出和贷款的重压，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是市场，什么是自负盈亏。

出于大局的需要，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推进减速了，社会办团也因此而失去时髦的光环成为一种累赘，我们的改革汇报因排不上日程而无人听取，就连我所在的党小组也不再接收我缴纳的党费……1990年5月，当贵州省轻音乐团在广州的演出落下帷幕时，我们决定不再继续往前走了，我带着队伍、带着器材、带着困惑、带着不解与疲惫，回到了贵阳。

之后，用演出结余的收入，用我和其他三位同事一年的工资，用折旧的器材还清了贷款，从而终结了贵州省轻音乐团这个民营艺术表演团体虽短暂，但却具有某种开创意义的生命历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是得益于那两年多时间里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模式中的摸爬滚打，让我对市场有了深刻的、切身的体会，而这些亲身的经历，便成为“杂技与



市场”这个论题宝贵的理论资源，很快，一篇题为《杂技演出市场分析》的文章便提交给贵州省杂技家协会。

1998年11月5日至10日，以“杂技与市场”为题的第六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提交会议的论文共53篇，会议结束后，我的论文《杂技演出市场分析》获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一届理论奖一等奖。【载《杂技论坛》·华文出版社·2000年】

1999年1月31日，我接到文化部艺术局原杂技处处长许素娥老师的电话，约我2月4日赶到沈阳观看沈阳杂技团新创作的主题杂技晚会《天幻》，第二天，我便从贵阳搭上北去的火车，经过四天三夜的长途奔波，终于在2月4日上午赶到沈阳。到团里后，总支书记魏启华向我详细的介绍了《天幻》创作的背景及基本情况，下午三点，在剧场观看《天幻》的演出。在剧场里，我与其他从各地赶到沈阳观看这台晚会的杂技界同行

证 书

刘斯奇 同志 《杂技演出市场分析》
获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一届理论奖评选 一 等奖
特颁此证



一样，被舞台上精彩、新颖、充满了创意的演出所吸引。在沈阳的那三天里，我向许素娥老师、团长安宁、韩明副团长等请教并询问有关《天幻》创作过程中方方面面的详细情况，从立意到策划，从人物造型到服装化妆，从道具设计到灯光布景，从技巧训练到节目选择，从资金来源到市场预期……同时阅读团里提供的相关文字和其他资料……在三天时间中连续看了三场《天幻》的演出。在第一、第二次观看完演出后，回到驻地，便立即把当时的观感用文字记录下来，在第三次观看演出时，我带上了一个微型照明设备和笔记本，边看边把演出中的舞美灯光的变化、音乐与表演之间转换的关节点，技巧与道具的运用……记录下来——因为那时还没有演出的视频资料，要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文章的写作，只有采取这种比较笨拙的方式才能弥补记忆的不足。

如果说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出的《银色畅想——女子抖轿子》是我第一次观看到的具有叙事意义的杂技节目，那么沈阳杂技团演出的《天幻》则是我观看到的第一台以主题命名的杂技晚会。是《天幻》在舞台上别具个性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结构，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主题杂技晚会在杂技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告别了沈阳杂技团之后，我便全力投入到对《天幻》的理论梳理之中，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3月16日，我带着刚写完的论文再次来到沈阳杂技团，参加文化部艺术局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杂技艺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对《天幻》进行理论梳理后的万字长文：《走向成熟的叙事——大型杂技晚会



《天幻》艺术分析》。

会议结束后，我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只保留了原文的40%左右，然后寄给了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杂技与魔术》。也许是得益于《天幻》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终于有幸与《杂技与魔术》牵手——《走向成熟的叙事——〈天幻〉晚会观感》刊登在《杂技与魔术》1999年第2期。从1996年我开始进行杂技研究到1999年，这是我第一次在《杂技与魔术》上发表文章。《杂技与魔术》作为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公开发行刊物，它的权威性，它的影响，它的读者面及其所拥有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1999年10月，第七次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论文《杂技与市场经济的思考》获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二届理论奖三等奖。【载《杂技论坛》·华文出版社·2000年】

还是在1999年，在当时那轰轰烈烈的出版物改革大潮中，根据贵州省文化厅的安排，征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的同意，我带着贵州省文化厅主管、主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化厅所属唯一公开发行的刊物《电影评介》，只身拖着一个装满稿件的拉杆箱，从贵阳来到深圳，以谋求刊物的发展空间。在深圳期间，有幸与中国杂技家协会的傅起凤老师相遇。傅起凤老师告诉我说：她在深圳欢乐谷参与推出的大型现代魔术晚会《梦幻神曲》，是一个企业投资五六百万重金打造的魔术晚会，领衔主演《梦幻神曲》的茹仙古丽是傅老师的得意弟子。同时，傅老师还向我介绍了晚会的一些基本情况，告诉